

月谷川上恒口堡

市直 李杰森

月河,发源于汉阴县境凤凰山麓高梁铺,与曲折回流的汉江呈“弓弦”状,似汉江弓之弦,从西北向东南迂回秦岭余脉与凤凰山之间流淌沉淀、积壤成川,在安康城上溯数里的许家台汇入汉江。

北魏郦道元作《水经注》云:“汉水右对月谷口,山有坂月川于中,黄壤沃衍,而桑麻列植,佳饶水田。故孟达《与诸葛亮书》,善其川土沃美也。”所谓坂月川,即由月河积淀而成的月型坝地,明清土人称月谷川,今人称之为月河川道。

郦道元从农耕文明的视角对坂月川的赞美溢于言表,而文中所言孟达则是三国名将,蜀蜀吴鼎足之初在由西城(安康)、上庸(竹山)、房陵(房县)三县组成的新城郡出任郡守,因在蜀魏之间摇摆不定、反复易主被司马懿斩杀于任上。经营此地多年的孟达对坂月川理理比郦道元更为熟知,更能体味风土人情,遗憾的是《与诸葛亮书》早已散佚,有关详述难以窥测,而“川土沃美”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二

好在农耕文明渐趋缓慢,对于自然环境的积极作用极其有限,从魏晋而至清中叶,想必月川并无二致,如落叶之静美,静谧千年。千年之后,关中大夫,方志大家王志沂亲历坂月川,极尽褒扬。

道光三年(1823年),王志沂跟随新任陕西巡抚卢坤游历陕南,从咸阳经汉中,在洋县渭门乘一叶小舟穿越黄金峡抵石泉县,十月初八达汉阴境内坂月川,立即被眼前景色迷惑:“俱水田,与江南无异,且道路皆坦途,竹树枫林,村居庐舍,与山光相映带”,直呼即使元明大家倪瓒、黄公望笔下的画作也不过如此。兴之所至,赋诗一首,题为《汉阴》:

不信蚕桑路,居然有此乡。

岚低枫叶暗,露重稻花香。

村居泉声绕,人家竹影疏。

溪山佳妙处,画格入倪黄。

王志沂是道光年间关中儒学代表,晚年撰修《陕西志辑要》,集陕西地理沿革和风土人情之大成,成为不可或缺的历史典籍,尤以《艺文志》为人称道。而这次跟随卢坤以阅兵之名的陕南行,用极具诗人气质的目光审视汉江流域有别于关中的独特风貌。从九月十九到十月二十三,共计三十余天,逐日记述了咸阳、汉中、安康、商洛、蓝田等地的沿途见闻和历史掌故,辑录成册,名《汉南纪游》;还有感而发,以所见为题,赋诗二十八首,集为《游汉南诗》,二书合成一本文集叫《汉南诗草》,散发出陕南特有的醇香,在与时空对峙中映照月谷川记忆的门楣。

父亲的手

裴祯祥

在这世界的各个角落,在所有江河湖海的岸边,我们都会看见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和风度翩翩的青年,头戴各式各样的遮阳帽,坐在小凳子或大椅子上,手握精美的鱼竿悠闲地垂钓。他们是这世上幸福的人,是我们应该祝福和赞美的人。他们垂钓不是为了没有鱼吃,只是一种情趣和爱好,是为了修身养性和消磨时光。

每当看到他们,我就想起父亲也是一位钓过鱼的人。父亲钓鱼不是为了修身养性和消磨时光,他永远也不会闲下来的时候,永远也不会奢侈到用钓鱼来消磨时光,他钓鱼是为了吃。父亲钓鱼的样子一点也不悠闲,不美观。在我的记忆里,他是中午下地回来,放下肩上的背篓和手中的锄头,穿着一身破衣烂衫,没有休息也没有吃饭,向邻居借了一根鱼竿,直奔村前的小河而去的。后来我知道,那根鱼竿是父亲手里拿过的最轻巧的工具,也是最沉重的工具,因为它负载着一片深切巨大的爱。那天,他静默而焦急地蹲在河中央一块雪白的大石头上,整整守候了一个下午。我那时四岁,比父亲更焦急地蹲在岸边,注视着手里鱼竿的动静和水面上漂子的浮沉。

世上那些喜欢垂钓的人们,都有一双细腻白嫩,用各种名牌护手霜呵护着的手,那是精致的手,柔弱的手,美丽的手,是握笔杆、敲键盘、执鱼竿的手。所有穷困而忙碌的人群中,只有父亲把他那粗笨和黝黑的手,在他生命中一个炎热而饥饿的午后,伸向了一根简陋的鱼竿。那只手是厚实而黝黑的,指头粗短,老茧丛生,在每一个冬季来临的时候,手心手背上就会裂开许多深深的口子,渗出殷红的血珠,像被滚烫的大地一样丑陋。

那天下午,坐在河边小树林里的我,眼看着通红的太阳从天空慢慢烧过,河上蒸腾着的朦胧雾气将父亲紧紧包裹,汗水不断地从他的额头和脸上簌簌滚落。我的心情

逐渐黯淡,最后终止于绝望。很显然,父亲那天是专为我去钓鱼的,因为我那天鬼使神差地突然非常想喝一碗鱼汤,于是哭着闹着要鱼吃。我只有四岁,我还会管家里有没有给我一碗鱼汤的条件和能力。于是我得到了母亲的承诺,等父亲下地回来就给我去钓鱼。那时候我想,父亲什么都能为我做到,他一定能给我钓到一条大鱼。但是,父亲没有钓到一条大鱼,甚至一条拇指长的小鱼,甚至一只可怜兮兮的小虾。

从那天我就开始明白,人有时候是会绝望的,人得习惯绝望。上帝般的父亲能给我想要的一切,但在他付出巨大的努力后,却不能给我一条小鱼。不能给我一条小鱼的父亲显得沮丧而可怜,他曾经拥有给予我一切的权威和能力,可是他不能给我一条小鱼。父亲失败的努力让我深深感到他的平凡和艰辛,而正因为此,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父亲的脆弱与顽强,卑微与伟大。

因为除过没有给我一条小鱼外,他给了我身体,给了我力气,给了我课本,给了我铅笔,他给了我在键盘上自如敲打出这些文字的细腻有力的双手。这一切,都有赖于他那双伤痕累累的手,和不再年轻的躯体。小时候,我常常想,父亲怎么会有那么一双手?看见那双手,我就想起小学课文里陈秉贵那双套不住的手。现在我明白了,是我和我的两个妹妹让父亲拥有了这样的一双手。

父亲的手是一双农民的手,是一双在冰水里泡、火焰上燎、黄土里刨、沙石里掏的手,是一双钓不上来鱼却能给一个家庭带来希望的手,是凝聚了生活中所有艰难困苦与心底里都带着深情的手。现在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,父亲的手,也是世上最美丽的手。

我那长眠在梨坡的先人们

旬阳 余德权

我出生的那个村子,叫金盆。可实际上,它既无金,也无盆,不过是秦岭山中一个普通而又贫瘠的小村子。

金盆有个梨坡。梨坡上下,散落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院落,都住着同一脉相传的族人。梨坡上的草木田地、梨坡村的沟溪杨柳,都沾满了家族的气息。

不知道先祖们当初为何看中了这个偏僻贫瘠的所在。从族谱中得知,他们在清道同年间,一路辗转,自西安安庆迁徙到湖北武昌,稍做停留,然后马不停蹄继续逆流而上,最终落户在这个叫作龙家河的小山沟里。从长江到汉江,再到蜀河、龙家河,他们像洄游产籽的鱼,一直逆流而上到水流的源头,到密山深处才停下跋涉的脚步,他们当初看中了这里的什么?是绵延无尽高低起伏的群山,还是荆棘遍布杂草丛生的荒野?抑或是一条时常断流的小河以及河沟里偶尔可见长不盈寸的子孙?所有这些,并不能让他们丰衣足食,只能让他们远离城市码头,远离集市人群,只能让他们终日劳累而所获寥寥。他们的迁徙,用现在的眼光来看,简直就是不计后果的归隐,一种与文明社会的决裂。令我费解的是,那个时候,家族并没有达官显贵巨富商贾,并没有因避祸殃仇而需要隐匿深山。国人素有安土重迁的传统,一个家族的逆流迁徙,一定是迫于无奈,一定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。

我不知道,当年没有火车飞机,这千余公里的漫长路途,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用双脚丈量过来的,途中的餐饮住宿是如何解决的,更不用说是暑夏风霜,他们是如何应对的。总之,他们一路风尘、一路颠沛,来到这个今天我们称之为金盆梨坡的地方,鞠一捧山泉,就放下了饱经风霜的行囊,停下了长满老茧的脚步。正如我无法猜想他们为什么要出发一样,我同样猜不出他们为什么要在这里驻足,繁衍生息。

每年清明,我在先祖坟前祭祀时,总会对着那些年代久

远的土堆,在心底一遍一遍默默追问。阳光明媚,万物葳蕤,轻风拂过山岗,松涛阵阵,而他们始终长眠不语。

还记得我小时候,除夕时家里第一等大事,就是团年夜饭,由长辈带着上山给人送亮。父亲给我一指引,我在他的示范下上山、烧纸、磕头,然后听父亲讲那些族谱中不曾记载的家族轶事,直到祖先的音容笑貌在我心中一点点复活,直到他们成了与我相关的有血有肉的人,而不只是眼前的荒冢和土堆。

先人们的坟冢,如同他们的人生一样平凡普通,乏善可陈。十多个土堆星散于梨坡,坟台全是片石干砌而成。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,家族的贫穷根深蒂固,他们当初的选择是多么失败。从江南的名门望族,到陕南的穷家小户,这便是长途迁徙远离故土的结果。而这,显然并不是他们的初衷。

长眠梨坡的先人,他们的坟冢也按照辈分从上而下排列有序,与族谱中的记载大体相当。山腰最高处的坟堆,据父亲说是上山祖兄弟二人的合墓,他们应该是安徽安庆人了。我粗略推算了一下,他们所处的年代,大约是清朝咸年间。

或许,他们兄弟二人正是在某个深夜,思虑再三才迫不得已背井离乡,匆匆踏上了前途未卜的逃难之旅。我想他们历经千辛万苦逃到这里时,已是衣衫褴褛饥肠辘辘面色如菜,面对这一片尚未被人占据的荒坡,哪里还顾得上挑三拣四,片瓦薄地立足就是万幸。也或许,当初他们并没有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打算,仍然日夜盼望着回归故土,仍然把自己当作异地的过客。他们只能观望等待,这一等,就是上百年,就是几代人。

先祖和他们的故乡亲人,只能是在梦中再见了!再没有故乡的消息,再没有亲人的音讯,在这个他乡异地,在他们生命危急之际,他们一定会股股叮嘱自己的子孙:勿忘故土,勿忘亲人!有朝一日,一定要回去看看,替自己完成未了

宿,街长四五里,人烟辐辏,一大市镇也。”

四

其实,在卢坤、王心沂途经恒口之前的嘉庆年间,恒口是有堡的,因为时过境迁,《汉南纪游》仅对街市作了记述,而对街上的城堡只字未提。翻开嘉庆二十年编撰的《安康县志》,一篇洋洋洒洒的《恒口堡记》赫然在列,作者为安康士人董诏,详细记录了筑堡的经过、规模和用途。

嘉庆二年,时任陕西按察使温承惠在平利、安康等地镇压白莲教义军,筹划建恒口堡,署理安康县令的赵廷麒率先响应,前后两次自捐白银一千六百两,募筹三千七百两,从嘉庆三年冬到嘉庆六年夏恒口堡建成,周长约2.2公里,高约5.3米,上置女墙约1米,四周筑壕沟,除四方设城门外,堡中偏西建重门1堵,甚为坚固。

嘉庆九年,各地所建城堡、山寨功用消逝,崩塌坍塌成为必然,恒口堡也未能幸免,特别是工业文明摧枯拉朽般推进,昔日堡垒不复存在,只有王心沂笔下的四五里长街尚存,今人称之为老街。

五

恒河入月河口西向逆河北岸而建的恒口老街,街道宽约三四米,青石铺地,左右两侧多为门市,一排排木板隔间开买与卖的距离,营造昔日市井的熙攘繁华,上下两层的重檐结构,依依低垂,呈现陕南民居少有的古建筑风格,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承载斗转星移、雨雪风霜,成为一代又一代古镇人的眷恋和挥之不去的惆怅。庭院多为两进,也有三进,透过脚踏天井的脚步似乎能听到窗格内经年沉睡的呼吸,不紧不慢,起伏有致的节奏只属于记忆之外的安详。屋顶硬山灰瓦,马头山墙,高矮不一,次第铺陈,目光所及之处,高楼林立的现代建筑所呈现的逼仄感,使整条街道充斥着孤独和摇摇欲坠的倔强。

多年前曾在街上小住,几经探询,街上老人说以前还有江西、贵州诸多会馆,言语之外颇多自豪,只是故地已无从寻觅。我住在一个同学家里,是一个两进的小院,格局尚在,父母早逝而家境没落,因为兄弟分家的缘故,已经拆分重组的七零八落。小院后面隔着一畦菜地就是月河,河水清冽,不时有淘金者躬身忙碌,在茫茫砂砾中淘洗着生活的虔诚和对月谷川的敬仰。

手压式水井是那时每个小院的标配,也是小镇与月河最直抒胸臆的沟通,随着井上手柄的起落,地下水汩汩流淌,纯净甘冽,与小镇的建筑一道成为月谷川上独特的气韵在时空更迭代进中流散。



心愿

所以,从我记事时起,每年除夕,我的父亲便会在灯笼上郑重其事地写下“安徽省安庆府”字样。我能理解,那个子孙孙幼年提及的地方,是先人们朝思暮想回到的地方,是先人们无数次翘首以望的地方,是祖祖辈辈的门口相授与梦寐以求,如同死不瞑目的陆游在《示儿》里的泣血以告一般: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!”,那也是先人们心中至死也无法排除的极大悲痛和终身遗憾。

远离家族和故土,使得他们在那个极其讲究祖辈传承的社会,甚至连儿孙的字辈也无从知晓——我比过族谱,我的大爷爷和爷爷两辈人的排行,竟然与族谱迥异!20世纪50年代,眼见他们和家族渐行渐远,太爷们终于做出了一个无比艰难而又意义重大的决定,他们凝聚所有力量筹集盘缠,派人回安徽迎取族谱。背负家族重托的爷爷,迎着当年上山祖的逃难路,踏上了寻根之旅。他从梨坡出发,沿龙家河、蜀河而汉江、长江,顺流而东,风餐露宿,历尽艰辛,一路问讯,最终到了安庆,见到了家族亲人。尽管已历百年,可是寻根的游子后人,仍然受到了合族人的热情招待,并如愿迎取到了一部珍贵无比的宗谱——因为它的出现,我们和先祖间断百年的联系才得以重新延续,漂泊的游子重新找回了家族精神之根!

可以想象,当年迎回族谱后,太爷爷们是如何地兴奋与激动,鼓乐、鞭炮和欢声笑语,那场面一定是异常隆重。他们一定视族谱为家族珍宝,爱护有加。他们从族谱中终于知晓了先人的故乡,知晓了山外的世界,知晓了家族传承,知晓了祖训家风。那些线装的书本,因为记载了家族的历史和先人的信息,也因为它是我们和先人跨越时空的唯一交集,而被我们视为神圣不可亵渎的圣物,并不是家族的每个人都有机会阅读。直到我参加工作后,才有幸被父亲允许在大年初二的清晨开箱观赏。因为机会难得,我总是无比虔诚恭敬,心中充满敬畏。

历经六代传承,我们终于融入了脚下这片原本陌生而贫瘠的土地,与这里的山川河流相依相伴。盛世今日,安宁祥和,我那远离故土葬于梨坡的先人们,终于可以长眠了吧!

“我也是老瓦房人。”这算是接上头了。“住瓦房哪里的?”几句话就对上暗号,话匣子就此打开,迟疑的脸上摊开笑容。

老瓦房人是个相对宽泛又带有特定范围的专有名词,特指库区移民搬迁前居住、生活、工作在瓦房店那块地界上的人,虽说搬迁后,瓦房店这个地名还延续了一段时间,但基本上不再归属于这个说法。另外还有一个和现在差不多的属地规则,在那个时间段里离开的也能算是老瓦房人。

小镇不大,街长二里来地,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老房子,相当长的一段时间,瓦房人对古老建筑呈现出一种麻木、视而不见的状态。哦,这是吴乃武的老房子。小学在武昌馆。供销社社的房子最早是晏家院子。郭家油坊原来就在那。见得多了,眼界自然就变得宽广,语气里透着不当一回事的味道。

街房子多的原因是这里自古就是经商淘金地,据记载,一时的繁华程度堪比县城。商号多,自然手艺人就多,找个老人随口就能说出清河嘴刘醋客做醋、上街周线客、郭家铺子的油篓子、补碗的汪碗匠、桥头李孝贵的米浆馍、剃头铺子的宋师、打金刚刷子(蓝酥饼)的卞老汉、地理先生李任银,一个个不起眼的名字后面就隐藏着一段段稀奇古怪的人物故事。

瓦房店可以说兴在河道,败在河道。清河在上街头汇入任河,流经整个街道注入汉江。没有通公路,铁路时,水路下汉口,逆流而上,可通往四川大竹河,由此形成陕南一个重要的山货集散地。水多水患自然就频繁,虽说没有达到年年洪水洗街的局面,但隔上几年就会出现一次搬家的场景。因此,街面上的房屋大多采用全木结构的建筑形式,原因不外乎两种:不念移民原居地的风貌;减少损失,涨水时把能拆卸的木结构尽量拆走。

各地的商人在此停留,为解乡愁,纷纷建起同乡会馆,会馆多庙会自然就多,有会就要演大戏,除了请外地的班子来交流,瓦房店本地的班子、社社多,会唱会演戏的人也多,历史上出过清末民初工人大丑的汪彩凤;民国时期原工文武小生,后改须生的左友智;旦角李冬娃。地方不大,但人们活得不憋屈,移民骨子里那种生来就有的乐天性格,生活在任何环境都能找出乐趣,喜欢赶热闹的人自然就多。至今留有趣话,有年正月里玩彩龙船,万事俱备,就差一条喜庆的船围子,桥头的马老汉二话不说,回家就把床上铺着的一条半新旧红毯子被面拆了拿过去,一扯两半,刚好够长短,至于家人埋怨啥的,事后再说。

爱玩是为了眼前快活,对文化教育,瓦房店人也有值得骄傲的地方,前有出生于小镇上的明朝兵部尚书刘四科;清道光四年利用修“东来书院”的余款兴建的“鸡公滩义学”;清同治八年,育婴会总经理吴凤翥;红色教育家郭抵;民国风云人物吴乃武联合各大商号筹资改建的“保国民小学”,校址一直沿用到现在。近有一门三学子的王焰、王群、王丽三兄妹,以及通过考学、参军,招工离开小镇的诸多青年才俊。有以国画成名的李天海;以书法成名的毛文凯,中学时期,他的随手画马早就享誉校园;年轻时以帅气,投篮潇洒,中年后以书法得名的徐兰平。文学上瓦房店写手也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特点的群体,文学多面手刘氏父子;刘培森、刘全军;税务所阅楼油灯下,声情并茂用普通话朗读自己文章的高维;写散文的周平松;记录瓦房店真事的汪剑创、刘清和等。

说了这么多,老瓦房人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,说好听点,把事都看得都淡;难听点就是上进心不足,虽说都在各行各业里辛勤耕耘,收获颇多,但都不大显山露水,不善于钻营,这或许和骨子里的傲气有关;我把那么大的一个老家都割舍了,其他事算个啥!

汉江随笔

安建凉面

市直 束宝荣

安建凉面,俗称“高高楼”,这凉面的名称,只是让安建的师傅们把它口语化了。一般每周二,若去安建职工食堂就餐,职工们见面,一定会高兴地说是“高高楼”。

安建楼前身原叫安康县建司,在计划经济时期,其技术力量雄厚,吃饭人数之多,据说有时高达二千多人。那时吃饭排队的工人们,犹如一条长龙。

安建的凉面,得先由源头说起。安康民族特色小吃,尤其以蒸面闻名于世,可谓家喻户晓。但是也许年轻人不知道,最让安康人垂涎三尺的老字号蒸面,当属鼓楼西麻苏福家蒸面,其名气大,味道好,吃到香,誉满安康;而安康西关黑牙蒸面也毫不逊色,蒸面佐料足,耐嚼细品。这两家蒸面,堪称当年安康民族特色小吃的一道风景,至今让人念念不忘。安康东西二关,在过去年月里,可以说都是市井烟火街区,而西关则是以摊贩,手工业作坊,尤其是七里沟西津古渡口,它是连接汉江南北两岸最为繁华和重要的老安康交通要道。于是,西关黑牙家看准了这个商机,加之居住又临近西旱码头,以诚信为本,苦心经营,既做蒸面,也精心手工制作凉面,面向码头上一些下苦力的人,以吃饱吃好,质优价廉为标准,迎合了安康人酸辣口味儿,也就是地道的正宗凉面。其凉面呈金黄色,在担子前双手托碗,用手抓高高抓起,且垒得很高,油而不腻,量大味美,香气入鼻,也就是“高高垒”,并用各种丰富调料,精心熬制醋汤,焯熟的豆芽和芹菜垫底,在凉面上浇上芝麻酱,大蒜,芥末,油泼辣子等调料,色香味俱全。于是,只见苦力人挽起袖子,美美噙上一大盘,扯着嗓门吼,明天给我留着,并一个劲儿竖起拇指称赞,很受吃客们的追捧。因而,黑牙的凉面声名远扬。

那时,职工食堂有个叫刘永寿的老师傅,原是瓦工出身,后改行成了职工食堂的大厨子,因公司千人吃饭,众口难调,让刘师傅很费脑筋。他就前去西关黑牙那儿取经。从此,安建的“高高楼”由来,就是从那儿学来的手艺。安建凉面在制作和工艺整合上,刘师傅也动了一番脑筋。首先,以柴灶烹饪煮面,将自行手工作碱面,放入适量的食用碱和水分,和面均匀,将拌面讲究力度,要有筋丝,若碱面下在开水大锅里,煮而不烂,筷子拨弄绵软,掌握适宜火候,然后在面熟后捞于案板上,用筷子挑起,烧熟菜油盘面,蓬蓬松松,金黄亮晶,再配上佐料,放上焯好的芹菜豆芽,及精心熬制的醋汤,最为要紧的是浇上油泼辣子,色香味美,馋的人直咽口水,这就是安建凉面的特色。

安建“高高楼”在安建人的心目中,它是安康凉面的典范,从制作工艺流程,至美食入口,环环紧扣,丝毫不马虎,筋道与火候掌握恰到好处,让人吃后唇留香,就连剩下的醋汤,也端起碟子一喝而尽。安建人爱吃“高高楼”,就连退休多年的老师傅、老领导,对“高高楼”情有独钟,每到周二公司职工食堂做凉面时,老早就前来食堂排队凭票就餐。

忽一日,听人说师傅虽已年近古稀,怕“高高楼”这门手艺失传,便带着儿子又做起了“高高楼”,而且安康多吃客们都是奔着曹胖子而去,不信你去安康小北街曹胖子凉面十店品尝一下,一定会让你吃得津津有味。